



【忆海拾珠】

杨士骧如何做到『山东无河患』

□韦钦国 常辉

“黄河无岁不决，河患日深”

杨士骧(1860年—1909年)，字莲府，祖籍安徽泗州，光绪十二年(1886年)进士，任职山东巡抚期间清廉有为，颇有政声，为山东经济、文化、行政等做出了贡献。特别是在任期间治理黄河，做到了“山东无河患”，这在那个年代殊为难得。

黄河决口是古时历代历朝的心腹大患。据《近代中国灾荒纪年》载，咸丰五年六月十九日(1855年8月1日)，“黄河于河南省下北厅兰阳汛铜瓦厢决口，正河断流，漫水西趋复折往东北，使黄河改道经山东大清河入海，成为近代黄河灾害史上重大事件。”这个重大事件表明，咸丰年间黄河入海口由江苏北向转到了山东境内，黄河下游的山东黄灾从此变得日益严重及频繁，这次改道的结果是“河水直注山东，菏泽、濮州以下，寿张、东阿以上，尽被淹没，波及之区更广。”此后，山东几乎每年都遭遇黄河之害，区别只是程度不同而已。

据统计，从1855年黄河改道至1908年的半个世纪间，黄河下游平均三年两灾，后20年间几乎年年发大水。同治六年(1867年)“黄河盛涨……菏泽、临沂、郛城、濮州等86州县”受灾；光绪二十一年(1895年)夏“山东利津、寿张、齐东境内黄河决口，运河、卫河亦漫溢。济南、齐东、寿张87州县”受灾。

《再续行水金鉴》一书记载了光绪十年(1884年)时任漕督吴元炳奉旨勘察山东黄河时看到的情景，“凡两岸遥堤内外，清黄汛溢数百里，小民荡折离居，啼饥号寒，无所棲止，昏垫之惨不堪触目。”人们熟知的光绪二十九年(1903年)成书的《老残游记》开篇说的也是黄河水患之事。

那时，黄河每次泛滥山东，平均都有七八十个州县受灾，面积广，人员多，水灾导致灾民流徙，社会动荡，政府每每投入巨资治理、救灾，从光绪十五年(1889)起额定年防汛经费六十万两，但真实数字要远高于此——水灾年份要额外拨银八十万两，也就是每年达到一百四十万两。虽然投入巨资，但防灾、救灾效果并不好，水灾倒越来越频，治黄成为了历任山东巡抚必须面对，但又束手无策的一大难题。

李秉衡曾于光绪二十年(1894年)至二十三年(1897年)担任山东巡抚，他曾颇为无奈地表示，“迨光绪八年桃园决口以后，遂无岁不决，无岁不数决……河患日深，民生日蹙。引亦智勇困之秋也。”其无奈之情溢于言表。但这种情况在杨士骧担任山东巡抚后有了根本性改变。

“河道疏浚既成，山东无河患”

杨士骧自光绪三十一年十二月(1905年1月)署理山东巡抚，光绪三十二年七月(1906年9月)实授，至光绪三十三年七月(1907年9月)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，实际任山东巡抚时间为两年又八个月。

杨士骧升任山东巡抚后，面临的一大难题是“河贯东省千余里，淤高而堤薄，岁漫决为巨害。”(《清史稿》)在杨士骧看来，“河患不平，倾帑不足，更费无以及他事”，认为只有治理好黄河才有钱财、有精力处理其他大事，才能长治久安，所以他上任后“首倡兴修水利”，将治黄放在了重要位置。

杨士骧自调研后发现，“河灾所由衍溢者，以不肖官吏因缘以为奸利也。”针对此，他“乃定章程：岁安澜，官奏叙，弁兵支款如例；河决，官严参，不得留工效力，弁兵依律论斩。”(《清史稿》)他从激发官吏河工的积极性与责任心入手，将治黄救灾效果与官员升迁、河工待遇联系起来，如果“河工员吏利兴修”就“迁擢”，河决则严重处罚。

更为难得的是，杨士骧亲自“身巡河堤，厉赏罚”，亲临治黄一线起到表率作用，河官弁兵便不敢有所懈怠。通过身临其境，掌握了真实情况并起到了监督作用，短时间即取得了“河道疏浚既成，数年内山东水患大减”与“自是数年，山东无河患”的成效。

根据《近代中国灾荒纪年》一书的统计，杨士骧任山东巡抚的前五年黄河山东段每年均泛滥成灾，自他到任的1905年至离任后的1908年连续四年黄河均没有发生灾难，这说明杨士骧的治黄策略确实起了作用，百姓亦从中获利，基本能够安居乐业。这是其诸多前任所未曾做到的。

对此，当时知名学者罗振玉与杨士骧有过如下一段对话，罗问杨：“(山)东省有大政二，一黄河，一外交，皆难措手，公何以处之？”杨答：“黄河溃决，由天者半，由人者亦半。予严责当事，厚赏罚，幸得无事。”(《雪堂自述》)这足以看出杨士骧对治黄策略及对治黄结果的自信。正如他讲的那样，黄灾频发固有自然原因，但也与官吏百姓疏于管理、懈怠对待有很大关系。

杨士骧对治河是有心得的，他代表世凯升任直隶总督兼北洋大臣后，光绪三十四年清廷商议修永定河，杨士骧曾上疏：“全河受病，一由下口高仰，宣泄不畅；一由减坝失修，分消无路。”认为“卢沟桥以下旧有减坝，年久淤闭，宜折修，并挑减河。”这种判断已具备了相当的专业水准，只是后来因故没有实施而已。

杨士骧身居高位但能够体恤民疾，与其宽阔视野与开明思想有很大关系，他是有真才实学的，并不像一些人认为是因为攀附了李鸿章与袁世凯才升到高位的。杨士骧出身名门望族，其祖父杨殿邦系嘉庆十九年进士，官至仓场总督、漕运总督。杨士骧兄弟八人(三人早世)，包括他在内五兄弟有四人中进士、点翰林，当时官场流行的“五子登科”说的就是杨家。老大杨士燮育有八子，分别留学美、英、日等国，长子杨毓璋从日本学成回国后成为金融家，曾任沈阳电话局和电报局的督办、中国银行行长，杨毓璋的儿子杨宪益先生是我国知名翻译家。

【故地往事】

苏轼与滕县西园

□孙南邨

宋代滕县(今滕州)有一名园，因位于城西，曰“西园”。苏轼、贺铸(贺梅子)曾到此游览，并有诗记之。

宋熙宁十年(1077年)，苏轼知徐州，当时滕县为徐州辖，县令是范仲淹第四子范纯粹。苏轼对范文正敬仰已久，对其子范县令称之“同僚”，“一见如旧”。此时，滕县“高明硕大”的116间公堂吏舍刚刚修葺一新，苏轼见之认可，写下《滕县公堂记》文，以记其事；城外有一西园，苏公到此兴浓，联想到树木与树人之事，写下《滕县时同年西园》诗，以记其游。

苏轼所记滕县公堂至今已近千年，几经修复，老县衙旧址犹在，现为省级文物保护单位；那么苏东坡、贺梅子为之题诗的西园又如何呢？

苏轼游西园是在宋代元丰元年(1078年)秋天，所记西园景象是“池塘得流水，龟鱼自浮沉。幽桂日夜长，白花乱青衿。”元丰八年(1085年)，也是秋天，贺铸由徐州往郢州路经滕县，写下《滕县时氏园池》诗，其描写是“城隅树交荫，楼下水通流。鸂鶒鸣深竹，蜻蜓驻小舟。”从两人的诗作可知，当年西园花木繁茂，水绕楼台，是一处颇为幽雅的园林。雅园，必由雅士建造；问其园，当思其人。苏轼游“时同年西园”，“同年”为谁？贺铸所记“时氏”，“时氏”安在？诗传于世，读者对此心有疑问。

滕州有宋代《李氏莹域香幢记》拓片传世，书写人是“溧阳时效”，书写的时间是“大观丁亥”(1107年)。当年滕县果然有时氏，时氏家族果然有文化人。清同治年间，王宝建先生在读滕县《香幢记》拓片札记中说：“未署时效力书，字画遒劲，酷类当时蔡元长一派……滕时氏，故宋望族，苏文忠(苏轼)有《滕县时同年西园》诗，元林君《静乐园记》指时氏园为德邻。近时，邑孝廉黄冶山先生作《时氏园石记》，深以其名不传为憾。余按幢记大观丁亥，上踞公嘉佑登第已四十余年，西园主人其犹灵光独存耶？里居姓氏阅七百余载，独以是懂得传，抑又幸矣。惜冶山先生未之见，不获与西园遗石并传也。”“溧”，滕州河名，《水经注》有注：“黄冶山”(黄来麟)滕人，清道光辛卯科举人，此人曾为西园遗石作记。

滕县西园又怎么样了呢？王宝建《李氏莹域香幢记》跋文有“元林君《静乐园记》指时氏园为德邻”句，说的是元代林应开先生写有滕县《静乐园记》，此文载于滕县旧志，文中有“西北角与时氏园亭为德邻也”之言，说明时氏西园到元代或存在、或可指看旧地。查滕县现存最早旧志(明万历十三年)记有静乐园，不见西园。

清代康熙五十六年《滕县志》对静乐园记之依旧，而新增“艺文”却没有收入苏轼、贺铸滕县西园诗。贺诗或许流传不广，苏轼诗当不罕见；明代《滕县志》“选举谱”，对苏轼诗曾提及“而苏轼同年见诗文，名氏不存焉”，清康熙《滕县志》，何以苏轼未收入志，以为孤诗难证其园吗？一代名园西园真的是湮没无闻了。直到清代中期，滕人黄冶山先生得到西园遗石，作文记幸，这才把沉睡数百年的西园意识在滕地唤醒，清道光二十六年《滕县志》后补本，始把苏轼西园诗入志。

上世纪80年代，滕州人李祥麟先生对西园故址做过考证。他依据林应开《静乐园记》“西北角与时氏园亭为德邻也”，及滕县旧志载静乐园“在城西南隅”之说，推之静乐园“按方位考其遗迹，即民国年间之刑场‘鳖盖’处，位于今滕州市荆河路于新兴路交叉路口以东。其西北角时氏园亭，当位于今工艺美术楼西北处。”滕县曾有俗语“鳖盖”之地，就在城西南护城河外，应该说李先生所推西园故址大致是不错的。看苏、贺先生诗，西园不仅花木众多，而且可在池中荡舟，此园不小，其确切起止处，已不可知。

滕州老城外西南不远处，现有地名“西南园”，是否与西园故址有牵连，现也难以细考。据《滕西办事处志》记载，清末民初此地多有私家园林，最有名的是徐家花园和陈家花园。徐家花园用地60亩，清代历城画家郑谟先生曾为此园作画；后来此园转卖给民国名将张锦湖先生家用。陈家花园用地8亩，园主原为毛家，后转卖给刘家，再转卖给陈家。还有东花果园，先为徐氏，后为朱氏所有，用地22亩。抗日战争期间，滕县西关外秦家建一苏州园林式花园，王学仲先生在花园落成前应征写一对联：“不爱钱原非易事，太要好亦是私心”。当然，这些花园现今都不存在了，说来西园和静乐园存世的时间还较长些，西园更是因人名效应而影响深远。



▲杨士骧



投稿邮箱:

qlwbrwq@163.com